



中东变局与中美大国关系

时间：2014年10月27日 13:00

地点：清华大学公管学院一层报告厅

齐晔：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这次由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的特别活动，在介绍我们今天的演讲人之前，首先让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

他们是一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和布鲁金斯中国中心负责人李成教授。

我们今天将要探讨的是中东问题以及在这个背景下的中美关系，国际舆论认为中美关系将对当前中东局势发挥重要的影响力。我们每天都可以从新闻上看到关于中东冲突甚至动乱报道，虽然中东在地理上远离中国，但对中国却有着巨大的战略价值，尤其是随着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对中东能源、石油进口等方面产生了更多的需求。中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量不断增加，目前已成为中东石油的第一大进口国，未来也会有更多的投入。那么中国就需要考量当前的中东局势，制定相应战略，然后和美国这样的合作伙伴共同推进这个战略的实施。在中东地区，美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是解决很多问题或者是推动问题解决的重要力量。

我们今天有两位学者来到现场，这两位学者也在这个领域当中有丰富的经验。

第一位是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外交政策项目主任 **Martin Indyk** 博士。外交政策项目是布鲁金斯学会五大项目中最大的一个分支，**Martin** 因此也是我的上级。最重要的是，他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在7月回到布鲁金斯学会任职之前，他是奥巴马总统委任的巴以和平谈判特使。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他曾两次担任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同时担任克林顿总统的特别助理，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东和南亚事务的高级主管，美国国务院负责中东

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他研究、教学和实践过程中，建立了一批研究中东和近东问题的重要智库，得到了该领域中许多知名学者的支持。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他为我们演讲，演讲之后，会有评论和提问时间。现在有请 Martin Indyk 博士。

Martin Indyk: 谢谢齐晔的介绍，也谢谢薛院长出席今天的活动。长期以来，公管学院和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合作卓有成效。我们非常感谢公管学院对布鲁金斯学会的支持。

布鲁金斯学会已经和清华建立了长达八年的合作关系，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我们的三大研究中心之一，其他两个分别在多哈和新德里。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其中最先建立的，我们希望把它打造一个全球性的智库，所以这个中心对我们而言非常关键，特别是在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大背景下。

还有一件事情很清楚，那就是中国和中东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反映中国在上不断增长的力量。如果说你把中国在中东的力量和中国在欧洲、拉美或者其他地区投入的力量相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中东发挥的作用还有待体现它的大国地位。在美国看来，中国需要对稳定中东秩序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中国对于中东石油进口不断增长的依赖度也是一个影响的因素，美国希望中国为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的努力。

中东的现代国家体系在很多年前已经建立，但其建立并不像在中国一样是当地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由英国和法国殖民者在一战之后人为划分出来的，像皮科（音）和赛克斯两位殖民者就划定了中东地区现代阿拉伯国家的边界。英国当时许诺，在历史上巴勒斯坦所在的地区给犹太人划分一个国家，由此形成了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约旦、以色列现在的边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人为分解的国家体系、边界或者说安排。这些中东国家的身份慢慢获得了国际认可，但实现的过程并不一致，或者说是像马赛克一样一块一块的，因为不同族群、不同信仰、乃至不同部落之间的自然居住区域与由殖民者所划定的边界并不一致。像古埃及的文明持续了 5000 多年，人口基本上全都是逊尼派，只有约 15% 是古基督教派。而沙特阿拉伯是由联盟形成的，阿卜杜勒国王和瓦哈比共同治理，宗教主要是基于瓦哈比教派的部落系统。至于其他的中东国家，是之前由殖民者人为划分的国界。

二战时期，美军填补了英军撤离苏伊士运河南部后的真空。美国当时和苏联正处于冷战状态，也对这个地区带来了一些影响。还有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在 90 年代时对科威特的入侵，当然最后是被赶出去了。时至今日美国成了这个区域的主导力量，美国基本上把重点放在确保中东石油的自由流动上，当然是从中东流动到美国以及其他的西方工业国家，包括日本。这就是当时美国在中东的主要利益。当然还要确保以色列国的生存权，

为了保障这个区域的安全稳定，我们当时决定要做两件事情，一是解决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这样才能够确立阿拉伯和以色列心脏地带的稳定。二是加强阿拉伯国家君主的权力，尤其是在沙特和埃及这两个国家，以确保这些国家的稳定性。当时美国既希望保护自己的价值观，比如民主、自由，也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但其实这方面的冲动在中东地区有所压制，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不管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认为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其他，所以我们和这些君主制的国家进行合作，即使这些国家并没有充分赋予人民权利，但是美国还是回头跟他们合作，以确保他们的统治或者镇压人民的成果是有效的，其结果就是忽略了人民的基本需求。所以说，我们总是面临着这样一种紧张关系，比如当价值和利益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总是会选择利益，有时候导致我们两方面都得不到，以致中东后来演变成了现在的混乱状况。在这样一个动态的局势下，尤其是中东当地的人民起义来要求自己的自由权利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选择和人民站在一起，因为之前选择和君主站在一起是错误的。

这段重要历史还有一节我刚刚跳过去没有说，在“9·11”事件之后，当时由于基地组织给我们带来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恐怖袭击，它产生的影响大家也知道，导致了布什政府做出一个决定，那就是把萨达姆赶下台，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权。在推进伊拉克民主进程的过程中，我们设法建立了一个以什叶派为主导的政府，但整个区域就开始动摇了，不稳定了。从埃及和突尼斯的革命，到利比亚的反叛，再到叙利亚的战争，再到如今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崛起，20 余万人死亡，500 万人流离失所。

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区域的秩序是在 100 年前建立起来的，而这一体系目前已经摇摇欲坠，甚至陷入到了一种革命之后的混乱状态，或者说是反革命状态。这场混乱导致了圣战国家的产生，也就是为伊斯兰国进行圣战的国家，给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带来了威胁。

伊斯兰国现在不断进行招募，对象甚至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其中大部分来自西欧和美国，但也有人来自澳大利亚和中国。伊斯兰国的崛起给我们带来的威胁不仅停留在中东地区，而是扩散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人们担心，过去几周当中在澳大利亚等地的恐怖主义行动将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现在在这个区域有三个基本的冲突，而且这三个冲突是互相交织的，使得在这种混乱状态中寻求秩序非常困难。第一个是巴以冲突，以前称之为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美国曾经让以色列和阿拉伯地区的一些其他国家签订了和平协议，把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冲突缩小到了巴以地区，这种冲突其实是应该通过 20 年前达成的《奥斯陆协议》来解决的，但现在巴以冲突演变成了一个长期性的冲突。我们看到，加沙地带今年夏天一直处在战争状态，这是加沙地带在 6 年当中的第三次战争了，而另一场战争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现在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有很多冲突发生，需要我们花很多精力去解决。

第二个是教派冲突（宗教冲突）。黎巴嫩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一些冲突已经扩展到了伊拉克、叙利亚之外的其他地区，比如也门，巴林等，甚至整个阿拉伯地区都被拖进了这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斗争当中。

第三个是逊尼派内部的冲突。这个冲突是一些保守派的逊尼君主——特别是阿联酋和埃及等国领导人，和穆兄会——也就是哈马斯的继子——之间的冲突。而且这个冲突在不同因素作用下极难解决。我们认为伊斯兰国对美国造成了威胁，于是我们试图联合中东国家共同抵抗，却看到这一联盟中的逊尼派君主国——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之间已产生分裂。他们不希望这场针对伊斯兰国的战争让什叶派以及伊朗得到好处——在他们看来，这正是我们打败伊斯兰国后将在伊拉克上演的场景。对于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来说，相较于伊斯兰国，伊朗才是真正的敌人，是战略对手，它的存在以及它正在推行的核计划是另一层面的威胁。他们同样不希望在叙利亚看到美国的空军成为巴希尔政权的空军。这里存在一个难题，即如果我们空袭伊斯兰国，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巴希尔政权，而毫无疑问他如今正胆量十足地朝着阿勒波前进，因为我们已被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转移了注意力。对于土耳其人也是如此，他们将伊斯兰国视为威胁，但认为这种威胁并不如库尔德工人党——一个从叙利亚、伊拉克转入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恐怖组织——的威胁更大。因此，

我们目前在中东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中各成员之间有着相互冲突的利益重心。而这仅仅展示了这三个相互交错的冲突所造成的复杂局面的一个侧面。

那么，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当然，我们必须找到打败伊斯兰国的方法，这是重中之重。为此，我们必须采取一种较为务实的做法，为我们目标的优先级进行排序，弄清我们的重点在于打击伊斯兰国还是打击阿萨德政权。我们仍需要时间去重建伊拉克军队以及安抚、动员伊拉克境内逊尼派部落的武装力量，保证后者在一个团结的伊拉克之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同样需要时间去训练叙利亚境内的武装力量，让他们有能力应对伊斯兰国以及阿萨德政权。在我们能够完成以上所有任务——包括武装库尔德的自由斗士——之前，我们是没有任何地面力量能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取土地的。我们可以利用空袭遏制伊斯兰国——正如我们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的小镇 **Kobani** 所做的那样，但是没有地面部队我们不可能真正夺回土地。而且至少目前美国人民仍然十分反对让美国部队重新进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土地。毫无疑问，奥巴马总统也极不情愿这样做，毕竟他承诺将在任内终结而非重启一场美国在中东的战争。因此这将是我们将遭遇的第一个挑战。

除此之外，要想重建中东秩序，我们必须重视发展与盟友的关系，这些盟友包括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湾国家，也包括土耳其、约旦、以色列、埃及。有趣之处在于，在我们提到的上述国家中，除了对土耳其仍不确定，其他国家都面临着共同的威胁，拥有共同的利益。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勒斯坦政权、约旦、阿联酋、卡塔尔，这些国家都对伊朗及其在叙利亚的盟友阿萨德、黎巴嫩真主党、穆兄会以及哈马斯抱有切实的担忧。这就为我们利用这些共同利益提供了可能。然而在此之前，我们仍需首先解决巴以冲突这一地区不稳定因素，这就需要美国重拾一种暂时强调地区“稳定”胜于“价值”的政策，因为我认为当下中东的动荡需要我们优先与阿拉伯国家——哪怕是专制政权——保持合作，从而实现地区稳定的重建，此后方能开始在该地区传播自由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基于当前的地区环境，我们需要暂时将地区稳定视为头等目标。

最后，关于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和角色，我认为中东地区的稳定自然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这有利于保证稳定的石油供给和石油价格。地区不稳定将给石油市场带来极大破坏，也将为中国的能源供给带来切实的难题。所以，我相信中美之间对于重建中东秩序存在共同利益。中国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起主导作用，但中国需要扮演好与自身利益相称的角色，

这也需要中国更加熟悉这里复杂而又有些不寻常的地区安排。这便是中美之间可从合作中获益的地方。

谢谢大家。

齐晔：谢谢您与我们分享您对当前复杂的中东局势的认识和见解，也非常感谢您关于中国在该地区角色和作用的评价。在此我也要提一下今天在场的几位中心非常驻研究员，有俞樵，还有葛艺豪（Arthur Kroeber）。我们在清华-布鲁金斯中心有常驻的研究员，更多是非常驻研究员，我本人是中心的主任齐晔。接下来我将要介绍今天的第二位讲者，唐志超教授。唐教授是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研究员，一直从事中东问题的研究，先后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他曾经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同时也是中东研究室主任。他现在是在社科院高级研究员，在中东问题的研究方面有非常卓越的成就，在关于中东、阿拉伯和以色列关系这些问题上，我们也经常看到他非常活跃，发表了很多言论。唐志超教授和 Martin Indyk 博士过去也曾经在华盛顿见过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有机会请唐教授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认识。

有请唐教授。

唐志超：很高兴在这儿能见到 Martin Indyk 教授，我记得是在 5 年前我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和 Martin Indyk 教授私下交流过，他说他还没有来过北京，我当时就很诧异，因为在布鲁金斯、在美国这么重要的中东研究的学者竟然没来过中国，没来过北京，现在见到了，而且我们这次是这样的一个主题，中东的问题越来越纳入到我们和美国顶尖学者的重点关心框架之下。大家也知道，中东问题也纳入到中美关系对话中，确实，中东问题对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构建越来越重要。

大使先生刚才谈的最中心的就是给我们介绍了一战以来整个中东的秩序，它是怎么形成的，是怎么坍塌的，未来怎么重建，中美在这其中扮演什么作用，他的好多看法和观点我都是很同意的。我想简单地作几点评论。

第一，我非常同意，一战以来形成的中东秩序正在坍塌，而且整个中东过去几十年来平衡稳定的局面现在已经被破坏，整个中东的政治生态也在改变，特别是“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的变化。“阿拉伯之春”最初的表现是政府和民间的关系的变化，但随后的发展，整个性质都在改变，民族的关系、宗教的关系、教派的关系、宗教和世俗的关系、军队和政府的关系，一系列关系都会被打破，包括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作用，最突出的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用，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都在被打破，所以整个中东的秩序确实处在重建的过程中，我说的是新旧秩序的重建，或者处在过渡阶段，从现在来看，这个过渡阶段可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未来10年、15年，现在这样的分析很多，当初“阿拉伯之春”出现的时候，大家都预测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渡阶段。

第二，大使先生刚才提到在旧秩序的破坏当中，现在确实存在着他提到的三组冲突，一个是教派的冲突，一个是巴以问题，一个是逊尼派内部之间的冲突，他认为这对地区秩序的坍塌起了一个最关键性的作用。我认为还有一个冲突大使先生没有提到，美国在中东秩序的坍塌中，美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它在这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角色。中东秩序的坍塌确实有历史根源，当初确实是人为而不是自然形成的结果，但是它真正被打破就是在2003年以色列战争之后，当年小布什政府打伊拉克的时候，我记得当年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警告，说这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事实的发展也正如他所说，整个中东从伊拉克到叙利亚、利比亚，从巴基斯坦问题到伊朗核问题的背后，美国的因素在中东秩序的坍塌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在这个问题形成的初期，美国人在这中间并不是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这个秩序的破坏中，美国更多的扮演了破坏的作用，最早的形成主要是英法的推动，但在坍塌的过程中，英法的作用基本上没有，主要是美国在扮演作用。

刚才大使先生谈到了中东秩序的重建，他特别提到了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但我个人感觉，伊斯兰国的问题可能不是中东秩序重建的关键，中东秩序重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个人感觉要抓住几个点，一个正是像大使先生一直强调的巴勒斯坦问题、伊朗核问题，第二个是叙利亚问题，美国人在叙利亚问题上必须重回一战之前的轨道。我记得奥巴马总统带今年初接受纽约杂志采访的时候提到了在中东重建一种平衡的观点，我个人对他的这种提法一直有很深的印象，确实美国在亚太有着再平衡，他是不是在中东有一种再平衡的想法，就是要重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朗人和沙特和以色列的这种关

系，如果把这种关系重建好了，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恢复秩序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大使先生提到了中美在中东发挥的作用，正像一开始提到的，十年前中国在中东的利益非常少，当年提到了中东在中美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第三方因素，但现在我们说它变得越来越重要，可能仅次于中国的周边，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地区。但中美在未来中东秩序的构建，包括地区安全的治理、地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政府现在特别强调的是国家的治理，我想中美对此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另外，我们现在提出以经济文化为导向“一带一路”战略，其实中美也有可以合作的空间。

我想，中美在中东的合作还是有限的合作，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都是有限的，我个人认为，奥巴马政府想撤离中东，我们中国虽然现在在加强对中东的关系，但要填补中东现在出现的权力真空是有限的。另外就是从中国自身的能力来讲，也决定着中美在中东的竞争或者合作都是有限的。

谢谢。

齐晔：谢谢唐教授。接下来到了讨论的环节，希望各位踊跃举手提问，提问的时候请自报家门。我作为主持人，利用这个优势，想先向两位讲者发问。**Martin**，唐教授刚刚说除了你所提到的三组冲突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导致中东地区不稳定、秩序混乱的原因，那就是美国政府在第二次海湾战争当中对伊拉克造成的影响，我想问您同不同意唐教授的这个评论？除了这一点之外，我还想问您，美国希望自身在中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对唐教授的问题也是类似的，您也提到了中国在中东的利益，那么能请您进一步界定一下中国的利益吗？以及，您认为中美之间在中东真的能合作吗，将会以怎样的形式进行合作？尤其是您也提到了，美国可能是中东地区问题的诱发因素之一。

Martin Indyk：谢谢齐晔，也谢谢唐教授的点评。毫无疑问，在 9/11 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已经花了 30 年、40 年左右的时间和精力去谋求中东的地区稳定。而入侵伊拉克和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这个决定，却实在是一个破坏地区稳定的决定。并且，做这一决定的前提是一个最后证明并不存在的威胁，也就是说，所谓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

做这一决定是希望在伊拉克境内建立起民主，最后的结果是使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政权上台，而在此之前伊拉克是逊尼派在统治什叶派。在伊拉克问题上，我们对付萨达姆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他对邻国造成威胁，为了防止伊拉克向伊朗敞开大门，因为这将威胁到我们在海湾地区盟友的利益。然而在对付萨达姆的过程中，我们抛弃了这一考虑，最终还是把他赶下了台，而他对伊朗其实是个真正的威胁，因此我们实际上使伊朗对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权产生了影响力，而这使局势更加不稳定了。尽管意识到我们的行为和其所制造的问题，我想，也应该看到我们的确是希望加大对伊拉克的投入，通过美国的介入带来伊拉克和周边地区的稳定。但这些并没有起作用。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投入努力，而是因为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冲突使得马利基政府只为了什叶派的利益而统治，并不是为了全体伊拉克人民的利益，而我们没办法改变这种情况，美国人民也不愿再投入此等时间和人力去改变这一境况。

所以，我同意，我们的介入造成了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尽管我们花了 10 年多的时间尝试恢复这一地区的稳定，但是没有成功。而且，这一行为带来的后果我们可以在伊拉克看到，也可以在叙利亚感受到，也就是由于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当遇到叙利亚问题时美国人民再也不愿意扮演我们曾经扮演过的角色了。当你想要在混乱中重建秩序时，美国民众对于美国在中东再投入的意愿却很有限，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眼下奥巴马总统在伊拉克发动的空袭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但超过这一限度民众是否会支持就很难说了。

此外，我认为当人们说是美国推翻了那些阿拉伯政权时，这一说法是错误的，这些政权——尤其是在埃及的政权，是埃及的人民推翻了它，是埃及人民的选票让穆兄会上台，也是埃及人民支持军方最终又将穆兄会赶下了台。穆兄会在民众中非常不得人心。我们对穆巴拉克的下台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相较于埃及人民的呼声而言是微不足道的。所以，的确，人们总是将美国归结为在中东挑起了一切事端，然而在这件事上是人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唐志超：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想作一点补充。

确实，就像 Martin Indyk 所说的，当前中东这种大的乱局的出现确实是有非常复杂的因素，我认为中东秩序变成现在这种局面，除了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之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是“阿拉伯之春”以及到现在的发展演化，第二个是这几年来，特别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对中东实行的战略收缩政策，我想，这两个政策是改变当前中东秩序的两个最关键的因素，美国从中东战略撤出和当年发出伊拉克战争的影响力不相上下。

另外是齐老师提到的中美在中东的合作问题，其实，中美在中东一直有合作，包括伊核问题、巴以问题，特别是在叙利亚问题上，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中美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认识也越来越趋于一致性，美国政府在叙利亚问题上最初的判断、认识，到现在应该说越来越跟中国的判断趋同。

构建中东的新秩序是中美未来发展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奥巴马政策和小布什政策的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奥巴马政策是重回稳定，而小布什政策是打破这种稳定。我想，在中东恢复秩序、恢复稳定上，中美有许多共同的方面，尤其是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可以做很多合作。

Martin Indyk: 我同意唐教授的说法，关于中国我还想补充几点。首先，中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在不断增加，而美国对于中东石油的依赖是在降低，其实美国现在不依赖中东的石油了，比如在奥巴马政府之下，明年我们会成为石油出口国，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改变，这使我们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和战略不一样了。当然对于石油的自由流动以及石油的价格方面，我们当然还是有很大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石油是流入了像中国、印度这样一些我们关键的贸易伙伴，以及欧洲、日本这样的我们的同盟国家。所以，这种利益还是在这里的，但是这种利益不是直接流入美国了，现在其实是中国在享有利益，还有一些其他国家也享有这方面的利益。现在美国的纳税人在为保障这些石油自由流入你们的工业而买单。我们在波斯湾部署了大量的军队来保证这种石油的自由流动，其实我们是提供了一种公共物品，当然由于经济的全球化我们在其中也享有利益。不过我还是认为需要说明的是，现在是我们在这里肩负重担，而中国却是在从我们这里获益的。

齐晔：下面请听众提问。

提问：三位老师好，我的第一个问题请教唐教授，我们注意到，中国前驻中东大使吴思科上个月发表了一个很有名的谈话，大概有 100 人在中东参与了伊斯兰国的培训，您认为伊斯兰国对中东是多大的威胁？中国政府有没有针对圣战组织的明朗政策？第二个问题请教 Martin，您刚才提到针对伊斯兰国的全球性打击，请问美国希望中国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提问：我的问题想请教 Martin Indyk，我来自于新京报。我的问题是，您认为中美之间在对抗恐怖主义的问题上最有希望的合作领域是什么？在即将到来的习奥会面中奥巴马总统是否会提及这一问题？谢谢。

提问：我来自南加州大学，我问 Martin Indyk 博士一个问题。我想请您更详细地说一下，美国具体希望中国在中东承担怎样的责任？是物质方面的援助，还是说派遣兵力去解决冲突？我问唐教授的问题也比较类似，就是说中国愿意以怎样的形式参与中东问题的解决？

唐志超：第一个问题，关于吴思科的报道我也看到了，我也没有相关的消息，但我从其他媒体看到的消息是，这一次伊斯兰国确实对中国的安全和利益构成了重要的威胁，威胁源主要表现在几方面。第一个，现在确实有一些人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这个数字有好多种。另外，我们现在的周边地区，不仅是国内有前往参加圣战，从东南亚到东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都有大量的人前往参加圣战，而且在周边地区还出现了容纳东突和资助东突的恐怖组织。另外，叙利亚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仅次于当年阿富汗圣战这种国际性、全球性的圣战，而这次圣战跟过去相比，它的威胁性可能更大，而且可以说是中国内部的东突分子、恐怖分子第一次加入了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恐怖网络，他经过实战的训练，加上从恐怖组织的网络的建立、恐怖手法和技术的学习，会使他们有一个更新换代、升级的可能性。另外就是对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的威胁，包括人员安全，包括我们对当地企业的投资，都构成了威胁。

Martin Indyk：对于中国能够做和愿意做的事，我们要保持现实的态度，首先要排除的就是中国派出军队的可能。我觉得原因是，第一，中国虽然愿意参与反恐合作，但是中国并没有感受到和美国同样的威胁，因此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出和美国同样的准备。但是美

国方面认为，未来的反恐合作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中国和美国都非常担心的一点就是自己的公民很可能会受到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吸引。伊斯兰国不仅传播破坏性的意识形态，而且不断进行招募，招募对象涵盖中国人和美国人。这些人会被送到基地接受训练，以增强恐怖组织的实力。我们已经看到了大规模的恐怖主义宣传在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出现，谁能料到以后他们是不是还在其他地方进行相应的宣传活动呢？这是中美两国共同的担心。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因为他国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威胁。合作可以采取互通信息，协调行动等方式，这是合作的第一步。我们要想方设法减少目前圣战组织不断扩张的趋势，因此阻止中国人进入伊斯兰国势力范围内的国家显得尤为关键。

第三方面，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有能力去贡献这样的行动，就是切断圣战组织的资金来源。圣战组织目前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来自海湾地区，一些金融交易，特别是石油走私等，使圣战组织获得了大量资金。我不知道中国在这方面能否提供帮助，但中国的绝对有这样的潜力。这就是我们目前可能的合作领域。

提问：两位教授和主持人，你们好，我来自政府部门。我的问题想提给 Martin 教授，刚才感谢您对中东当前局势的梳理，您提到当前的中东局面应该由中东人来负责，我想请问，中东未来的局面是不是也应该由中东人主导呢？第二个问题，刚才您提到美国在中东政策制定时提了一个核心词——利益，感谢您的坦率，我想问，美国政府在提出这个中东政策的时候前后出现了反复，那么，你们考虑的利益和文化、历史发展的关系是什么？或者说，美国的利益、中东人利益、全球人的利益怎么来平衡？什么是真正的利益标准？

提问：我是外交学院的老师，我想问一下 Martin 博士，巴以和谈破裂的原因是什么？

提问：我的问题是，出于在中东地区战略平衡的考虑，美国会不会打压或者降低我们中国在中东地区在重建过程中的重要性，或者降低中国在中东地区重建过程中的影响力？

提问：我是一名来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我想请问大使先生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能否平衡其与中国的合作？因为中国的利益和俄罗斯的利益是非常一致的，叙利亚问题就是很好的例子，美国如何能够在这方面达到平衡呢？

Martin Indyk: 巴以和谈的问题，我三分钟肯定是讲不完的，但是我尽量回答其他的问题，或者作一些讲解。

由中东人民来主导中东的命运，我觉得这应该是你的问题，这是美国政府永远面临的双重困境，是由政府还是人民来主导呢？这方面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我解释过，过去几十年以来，我们政府一直敦促当地政府去满足他们人民的愿望，但是我们发现他们都失败了，而且人民会反抗当地政府。现在我们面临的两难境地就是，一方面我们要去恢复秩序，但恢复秩序是否就意味着跟政府进行合作呢？这方面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要取决于实际情况，采取有效的平衡。中东问题的解决却是困难重重，我们尝试过各种可能的方式，比如一种比较中立的路线，但当前环境并不利于我们走中间路线，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到之前的稳定路线，然后再去寻求平衡，给人民带来真正的稳定和正义。

至于巴以和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才导致其失败呢？我觉得主要原因是相互之间缺乏信任，还有巴以民众也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大部分巴以民众都支持两国的解决方案，但是由于双方之间没有足够的信任，觉得这个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没有敦促他们的政府推进该方案的实施。所以说，谈判破裂是由于缺乏信任，我想这是冲突长期难以解决最核心的原因，而且对领导人的不信任以及两国之间的不信任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比如互相攻击、互相辱骂、谈判中互相质疑等等。巴以双方打交道的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互相都认为对方都不会真正地、有诚意地去构建一个和平协议，这种态度给整个和平进程带来了极大困难。而且我们看到，不管是耶路撒冷问题、难民问题还是边界的划定问题、互相认可的问题，内塔尼亚胡总理和阿巴斯之间的意见都存在很大分歧。93年的时候巴以签订《奥斯陆协定》，本来应该是在5年之内执行的，但20年之后仍然没能执行，这就导致了双方间不信任的进一步加深以及强硬态度的进一步升级。很多诸如此类的问题被证明是很难克服的，美国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

关于叙利亚，你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中国政府和俄罗斯政府站在一起，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而美国的立场则是支持叙利亚的反政权人民，把阿萨德赶下台。这也反映出了一些根本分歧，就是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保障这个地区或者国家的安全？就俄罗斯政府和中国政府而言，他们都相信保障叙利亚稳定的最好办法是支持阿萨德政权，而美国政府认为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叙利亚人民永远不会接受这个政权，尤其是在

20 万叙利亚人丧命之后。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政治手段赶走阿萨德，而不是巩固他的政权。显然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这样的争端。在当前的局势下，我们只能和而不同、或者同而不和，允许双方持有不同的意见。

齐晔：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积极参与到提问当中，很抱歉由于时间原因，有人可能没有机会提问了。请和我一起再次感谢这两位出色的演讲人。

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非常感谢。